

观点秀场

特别策划 共同富裕与妇女发展建言录⑤

《大山的女儿》：新时代「青春之歌」的「人民性」书写

编者按

近日,根据百色市新化镇百坭村“第一书记”黄文秀生前事迹改编的电视剧《大山的女儿》顺利收官。该剧从人民立场出发进行叙事,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脱贫致富的村民们的群像描写,成功地以“人民性”文艺观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我们借此看到无数扎根基层的干部做出的巨大贡献:他们服务的人民永远是历史的主体,而他们则是最值得被铭记的英雄。

■ 陈亦水

近日,根据百色市新化镇百坭村“第一书记”黄文秀生前事迹改编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一套顺利收官,以其追求质朴与真实的创作理念为扶贫题材电视剧打开了新局面。该剧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和强大的叙事推动力,从黄文秀个人视角和昔日贫困村的人民立场出发的双重线索交织进行叙事,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脱贫致富的村民们的群像描写,充满了艺术层面的真实感和历史的现实性,成功地以“人民性”文艺观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

艺术真实感:从人民立场出发讲好“中国故事”

《大山的女儿》作为一部扶贫题材剧,正如导演雷献禾所定位的那样:“我们拍的不是扶贫任务剧,而是一个人物剧。”这种以追求艺术品质为导向的创作,较为宝贵地呈现出“接地气”的真实感。

首先,人物真实感体现在毫不回避基层干部所遇到的现实困境,并从人民情感逻辑出发展现黄文秀如何坚守“同人民在一起”的立场。

黄文秀在抵达第一天就号召村民们一起打扫广场,却饱受村民非议“这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当晚,黄文秀宣布室内禁烟纪律,几乎所有人都跑到室外抽烟,导致会议无法进行。百坭村党支部书记甚至冲着黄文秀直言不讳道:“你不乱来,我们就给你打满分、让你镀满金!”当地人的行为动机及其情感逻辑可谓极为真实。

面对种种偏见,黄文秀不是责骂训诫、不是强制执行,不是“把教育农民变成教训农民”,而是从人民的立场和利益出发看待问题:与人民一起打扫广场,把椅子搬到院子里继续开会,勇于向反对自己的村民表达真实看法与感受,始终用以德报怨的态度开展扶贫工作,体现了黄文秀在处理与村民的关系时出色的领导力和行动力。

第二,情感的真实体现在黄文秀之于村民强大的共情能力,不仅带领百坭村民完成了物质脱贫,更实现了村民们的精神脱贫,这也是最打动人心的地方。

剧中,农战山叫黄文秀不要管见人就跑的懒汉黄元军,但她却认为“脏惯了,生活就更有盼头了”而发动群众一起打扫屋子,黄元军看到家里焕然一新后深受感动,跑到河边用河水洗刷自己,隐喻告别懒汉生活而自力更生的全新人生。此外,还有全村最富裕、却始终与黄文秀暗中作对的蒙昌龙,他的转变来自黄文秀动员全村齐心协力解决枇杷运输危机,最后回日本心而揭发了表哥吃回扣的事实。

此外还有个很重要的情感细节:在砂糖橘丰收后的脱贫庆功宴上,村民们发自肺腑地喊出“你是我们的家长!”但黄文秀说:“我不是你们的家长,你们的家长才是你们的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我的家长今天很高兴。”语毕却哭了出来。实际上,正是由于自己忙于扶贫工作而不能照看生病的父亲。这种细腻又真实的情感借助“家长”的修辞意涵,就将小我、小家与大国牵系在一起,把党和人民的关系紧紧联结在一起,进而呈现出黄文秀“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共产党员的最高人生境界。

历史现实性:以“人民性”文艺关照中国现实

《大山的女儿》最值得探讨的,更在于溢于荧屏之外的历史现实性。

或许正是因为主创团队坚守“人民性”文艺的创作观念,该剧并没有落入依靠编剧“金手指”推动剧情发展的“大女主剧”俗套,还摆脱了“女性的故事只有围绕男性才能讲述”的女性叙事窠臼,以人



民为中心,从黄文秀与人民之间的关系的处理和扶贫工作的具体表现来塑造人物。

尽管剧中不乏感情线,但皆以此来体现黄文秀“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坚定决心。例如韦明杰首次向刚从北师大研究生毕业的黄文秀表白:“如果我现在向你表白,你会为我留在广西吗?”而黄文秀却反问一句:“如果我现在向你表白,你会为我留在广西吗?”表明二人梦想与志向从此异轨殊途。

饰演黄文秀的演员杨蓉曾提到:“刻意没有将她塑造成一个坐姿和站姿‘淑女’的形象。她就是个平凡而伟大的女孩。”这种不刻意贩卖“颜值资源”、不迎合性别化审美的创作,对当代文艺现状来说十分稀缺,成功塑造了有魄力、有担当、有韧劲又朴实的女性形象。

荧幕之上做到不悬浮、不夸张,从人民的立场出发才能真正讲好“中国故事”。在荧幕之下,黄文秀事迹的伟大与感人,同样在于“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高尚品格,通过可贵的奋斗在平凡之路上创造了“伟大”。

现实中的黄文秀,既是当代千千万万个通过奋斗考上“双一流”大学的“小镇做题家”缩影,又是“忠诚于事业、不畏艰难、担当实干”的驻村书记,更是一名“忠诚于党、信念坚定、不忘初心”的共产党员。作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七一勋章”获得者和“时代楷模”,以榜样的力量激励莘莘学子,也是1800余名牺牲在一线的下基层干部的杰出代表,正如剧中黄文秀所言:“要扶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那些人那样自豪!”

回到这部剧,正如黄文秀拒绝大城市的物质生活回到山村,《大山的女儿》从剧本创作到美术设计再到表演,都一定程度秉持“人民性”文艺创作观,摆脱了唯“眼球经济”是瞻的浮躁的流量思维及其资本逻辑,真正以时代精神的传递为中心、以艺术审美为导向进行创作,让我们在荧幕之上真切感受到黄文秀的伟大,以及精准扶贫战略的重大历史意义。

在《大山的女儿》开创扶贫新局面的同时,根据“七一勋章”获得者、云南省华坪县女教师张桂梅专为贫困家庭女孩提供免费读书机会的事迹改编的《大山里的女校》,亦将在明年播出。就像前者结尾,黄文秀因公殉职后新任驻村书记到任时的画面所呈现的一样,我们借此看到无数扎根基层的干部前赴后继地为人民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他们服务的人民永远是历史的主体,而他们则是最值得被铭记的英雄。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仲英青年学者”)

阅读提示

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浙江成为全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被赋予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任务的省份。女性可以发挥“半边天”作用,从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创业等多方面,为实现共同富裕贡献独特力量。本文作者所在的课题组基于浙江这个独特的场域,通过走访4个县市地区,分析了返乡女性在数字创新应用场景下的困境和优势。

■ 裴彤

“十四五”规划纲要首次明确提出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2035年和2050年目标中,鲜明地体现了改善人民生活、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之所以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一是要具有比资本主义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创造出更多更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这是代表先进生产力要求的“富裕”内涵;二是要克服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和经济社会的不平等,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共同”含义。

“互联网+”女性创业就业服务体系建设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女性主体意识不断被唤醒,个体能动性不断被激发。互联网领域创业者中,女性占比已达55%。《平等 发展 共享:新中国70年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显示,改革开放40多年来,妇女创业机会更加多元,创业人数大幅增加。妇女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力量。

女性创业的活跃来源于国家政策与妇联组织从资金、项目、信贷、平台、服务等要素给予的支持。例如全国妇联开展全国女大学生创业导师行动,建立了“巾帼创业创新示范基地”,为创业女性聘请创业导师,提供免息贷款。

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浙江成为全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被赋予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任务的省份。作为国家共同富裕建设的排头兵,浙江承载了为全国其他地区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经验与示范的重要使命。女性可以发挥“半边天”作用,从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创业等多方面,为实现共同富裕贡献独特力量。笔者所在的课题组基于浙江这个独特的场域,通过走访4个县市地区,分析了返乡女性在数字创新应用场景下的困境和优势。课题组通过滚雪球及偶遇方式,联系返乡创业女性,进行一对一对面的半结构化访谈,深入了解职业女性群体就业环境,以及科学技术创新对其工作、生活、个人生活质量的影响,以掌握较为翔实的实证资料。在受访对象中,有来自“千鹤女性精神”诞生地浙江省建德市的网络主播,通过千鹤村梅城镇的数字化创业平台,销售宣传产品。也有在杭州上大学毕业后回家乡义乌创业的青年,还有多年在城市打工,近几年响应国家号召,回到家乡淳安开起农家乐的中年女性。不论她们的创业方式如何,其共同的特征就是“返乡”和“互联网+”。

“互联网+”平台促使就业生态呈现多样化、年轻化、线上价值带动线下就业的趋势。这种基于互联网平台的灵活就业模式,工作时间相对灵活,满足就业者工作—生活平衡需求。因此,越来越多的女性群体选择灵活就业。以网约车行业为代表,课题组在淳安县调研时,一位网约车女司机说道,“前两年我开起了网约车。平时白天我跑跑单,赚点菜钱,晚上收工,回家做饭,这样家里的事儿也不耽误”。

乡村旅游业建设与女性发展

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在乡村建设的进程中,党和国家密

集出台了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就业的政策,例如《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关于实施开发农业资源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行动计划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推动返乡入乡创业工作的意见》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女农民工、女大学生、女科技工作者,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返回家乡,把在“外面”积累的知识、经验、技术和资金带回家乡,参与农村发展建设,拓宽自我发展空间。

以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为例,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全国就业人员超过900万,这其中女性就业人员占70%以上。当地政府对旅游业进行扶持,为民宿经营者提供补贴,极大地鼓励了外出务工的村民返回家乡,积极加入发展乡村旅游的行列中。调研中,返乡创办民宿的梅姨说道,“当时村支书一直向农户们宣传各种办民宿的优惠政策,村里接二连三地开了好几家,听说做得还可以,我就从城里回来了,在家赚点钱,还能天天见到孩子,挺好的”。

衡量家庭地位的重要标志依旧是对家庭物质的提供和经济收入上的贡献,外出务工让“她们”有了一定的收入和经济独立的能力,返乡创业后更加拓展了经济活动,同时平衡工作—家庭。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的经济独立性逐渐强化,但传统的性别分工依旧会存在于她们的潜意识当中。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文化,依旧会影响女性的生活,“她们”独立性的提高,依旧受到传统因素的制约。

数字技术的地域与性别差异

数字技术赋能女性劳动能力与机会的同时,也与其他技术一样,可能扩大社会不平等,特别是数字性别不平等。在生产性劳动领域中,性别分工想要得到根本性改善,数字技术不是单一的力量,还与阶层、性别文化、组织和社会关系等因素密切相关。例如课题组采访到一位网红民宿的经营者卢姐,她说道,“我们家的民宿现在在网上也能预定,五一、十一的时候接单不断,常常爆满。年轻人会用网(互联网),可以帮我把农家乐的照片放到网上,吸引更多的游客”。

数字技术的发展,变革了劳动的组织方式、劳动工具以及劳动场所,使人们劳动效率提高,解放生产力。在农村,互联网技术提升了农村的信息化水平,农村的生产方式从以生产为中心,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以消费为中心。为女性带来了通过劳动获得报酬的机会与平台,进而提升社会与家庭地位。过去城乡差异的“信息鸿沟”在互联网、物联网普遍的时代也逐步缩小。现在农民与城市人一样,及时快速通过互联网获得资讯信息,物流的便利使得网上购物十分方便。

在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的语境下看,返乡就业、创业聚焦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回归,体现了一种与现实城市生活抗争和对未来乡村生活美好向往的行动逻辑。乡村社会要吸引外出人员返乡,需要强大的政策引导和产业导向储备。今后女性发展工作应发挥辐射带动效应,引导有知识、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女性群体,带动全体女性群体的劳动能力提升。同时,女性工作要关注数字技术的包容性,开展技能培训,提升女性应用数字技术的效能,预防数字性别鸿沟的加剧。

(作者单位:浙江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

注: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以及浙江省妇联、浙江省女性研究会女性/性别研究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乡村建设进程中推动女性走向共同富裕

来自浙江省的调研

中国视窗

《算法遮蔽下的社交平台性别议题反思》

作者:金姿姣 余达淮

社交平台是数字时代性别议题展开的重要空间,本文基于数据和算法构造起的社交平台使得性别议题面临着扁平化的性别形象塑造、伪普遍性的性别议题探讨和无差异的性别未来指向。困境的产生不仅源于社会现实矛盾,以数据和算法为代表的数字权力结构也使得社交平台上的性别差异或性别困境表达成为一种景观。为此,数据女性主义的提出旨在探讨性别差异和性别平等在新的数字权力机制下的可能性。社交平台必须树立自觉的性别意识,将情境性和过程性纳入数据优化过程,破除资本话语之下社交平台对数据、流量和热点的狂热追求。只有充分识别和拒绝资本对性别议题的捕捉、利用、包装和干预,才能为性别议题的探讨和问题解决提供更为健康的话语空间。

来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收入差距》

作者:李晓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程度逐渐下降,但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面对这一悖论,聚焦教育和职业之间的匹配程度,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2017)数据,对教育失配如何影响两性之间的收入差距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相比于同等教育程度的男性,女性更有可能发生教育失配,由此获得更低的收入水平。当男性和女性同时发生教育失配时,女性面临更小的收入惩罚,但这无法逆转女性因教育失配比整体过高而造成的收入劣势。变迁趋势分解表明,随着时期进程,教育失配造成的收入惩罚正在扩大,而由于女性的教育失配发生率持续高于男性,这成为两性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对此,加强女性从学校到职场的教育匹配,对于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女性公平就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来源:《教育研究》2022年第6期

《生育“事件”与城乡家庭妻子相对收入的变化模式》

作者:申超

本文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事件研究法,研究了“生育事件”发生前后妻子相对收入的动态变化模式,以及这种变化模式在城乡和不同受教育程度女性中的异质性。数据表明,无论在生育前后,城镇家庭妻子的相对收入都始终比乡村家庭妻子高。此外,本文还检验了生育后妻子相对收入的动态变化模式在城乡之间的差异,发现城乡家庭妻子的相对收入在生育之后均显著下降,且城镇女性由于在就业比例、工作时间、工资率等方面受生育带来的冲击更大,其相对收入的下降幅度也更大。研究还发现,首次生育一年之后,城乡家庭妻子的相对收入虽逐步回升,但均无法恢复到生育前的水平,说明生育带来的负面影响长期存在。通过引入受教育程度进行三层交互分析,本文进一步发现,女性受教育程度越低,生育导致其相对收入下降的幅度越大,且城镇女性比乡村女性所面临的劣势更大。

来源:《社会学评论》2022年第3期

(刘天红 整理)